

全国实用专业培训教材

新 闻

(下)

北科院

人民日报社培训中心编

全国新闻专业培训教材

新 闻

(下)

人民日报社培训中心编
(内部使用)

目 录

中国新闻事业史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报纸	(1)
第一节 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报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民间报纸	(3)
第二章 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的传入	(6)
第一节 近代报刊在华南沿海的出现	(6)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	(9)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	(14)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初期的报刊活动概述	(14)
第二节 戊戌变法前后的改良派报刊	(16)
第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	(20)
第一节 陈少白与《中国日报》	(20)
第二节 《苏报》与苏报案	(21)
第三节 《民报》与章太炎	(21)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活动的发展	(24)
第五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	(27)
第五章 无产阶级报刊的蓬勃兴起	(29)
第一节 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新青年》	(29)
第二节 《每周评论》与五四时期的报刊	(30)
第三节 《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中国第一批工人报刊的诞生	(35)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形成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	(37)
第一节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7)
第二节 《向导》的创办和党报体系的形成	(38)
第三节 革命统一战线下的新闻事业	(41)
第四节 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	(43)
第七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45)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45)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共产党地下报刊	(46)
第三节	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民主进步新闻事业	(47)
第四节	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的形成	(48)
第五节	邹韬奋、范长江的报刊活动	(49)
第八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5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一面光辉旗帜——《新华日报》	(51)
第二节	抗日爱国的进步新闻事业	(53)
第三节	国民党报刊事业的强化与对进步报刊的迫害	(54)
第四节	《解放日报》的创办与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	(55)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整风改革与成熟发展	(57)
第一节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整风改版	(57)
第二节	整风改版后党报工作的伟大成就	(58)
第十章	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变革	(61)
第一节	新华社——人民解放事业的强大喉舌	(61)
第二节	对“第三条道路”宣传的批判	(62)
第三节	解放区新闻界的反“客里空”斗争与毛泽东、刘少奇对新闻界的谈话	(62)
第四节	新闻事业历史大变革的完成	(64)

报 纸 编 辑

第一章	绪论	(66)
第一节	报纸编辑学的研究对象	(66)
第二节	报纸编辑工作的任务和特性	(67)
第三节	报纸编辑人员的素质	(70)
第二章	新闻稿的选择	(73)
第一节	稿源和用稿分析	(73)
第二节	编辑工作的先决条件	(74)
第三节	选择新闻的标准	(75)
第三章	稿件的修改	(82)
第一节	对新闻稿件中事实的订正	(82)
第二节	对新闻稿件中观点的修正	(85)

第三节 根据报纸特点对稿件的修改	(87)
第四节 改稿程序与注意事项	(100)
第四章 新闻标题	(102)
第一节 标题的功能	(102)
第二节 标题的类型与结构	(105)
第三节 标题制作的原则与方法	(111)
第四节 标题与正文的排列形式	(113)
第五章 版面编辑	(117)
第一节 版面作用与编排思想	(117)
第二节 版面基本知识	(120)
第三节 版面分工与版序	(120)
第四节 版面设计	(124)
第六章 专栏和副刊	(127)
第一节 专栏的编辑	(127)
第二节 副刊的特性	(128)
第三节 副刊的种类和形式	(130)

新 闻 摄 影

第一章 导论	(132)
第一节 摄影简史	(132)
第二节 新闻摄影及其特性	(134)
第三节 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关系	(135)
第四节 新闻摄影记者的素质	(136)
第二章 照相机	(139)
第一节 照相机的原理及其结构	(139)
第二节 现代照相机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158)
第三节 照相机的镜头和摄影附件	(151)
第四节 照相机的使用与维护	(154)
第三章 摄影感光材料	(156)

第一节	感光材料的发展简史	(156)
第二节	感光材料的构成	(158)
第三节	感光材料的种类	(162)
第四节	各种感光材料的性能	(164)
第五节	感光材料的选用及其他注意事项	(170)
第四章	曝光控制	(173)
第一节	感光的原理与方法	(173)
第二节	影响感光的各种因素	(174)
第三节	测光的方法与曝光控制	(174)
第五章	景深与焦距	(184)
第一节	什么是景深	(184)
第二节	影响景深范围的因素	(184)
第三节	超焦距	(185)
第六章	摄影构图	(186)
第一节	什么是摄影构图	(186)
第二节	摄影构图与主题的表现	(186)
第三节	摄影构图的要求	(187)
第四节	构图与光线的关系	(188)
第五节	摄影构图与构思	(188)
第七章	摄影滤光器	(189)
第一节	滤光器的原理	(188)
第二节	滤光镜与黑白摄影	(192)
第四节	黑白、彩色摄影通用型滤光镜	(194)
第八章	暗室工作	(198)
第一节	暗房的设施	(198)
第二节	几种主要显影与定影药品的性能与配方	(198)
第三节	冲洗感光片	(200)
第四节	印相	(201)
第五节	放大	(202)
第六节	暗房技术	(202)

中国新闻事业史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报纸

第一节 中国封建王朝的官报

有史可考的报纸产生于唐代。方汉奇教授认为“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中国近代报刊史》）

邸报由邸和邸吏负责传发，所以被称为“邸报”。唐朝的节度使权力甚大，所管辖的范围达数州之广，在其管辖范围内掌管着军队、政务、财政、任命官吏、丁亩税收之权。唐玄宗时，边境地区共设十个节度使（卢龙、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剑南、岭南、安西、北庭）。安史之乱以后，不仅边境地区，而且内地诸州遍设节度使。节度使在京城长安设邸，派驻京城的官员称邸务留后使。报纸由邸务留后使负责传发，所以称为邸报。

我们说邸报起始年代不晚于唐朝。

戈公振先生在研究唐代邸报时，在《经纬集》三卷九页中发现了《读开元杂报》这篇记述。《读开元杂报》是唐朝人孙樵（可之）所写。孙樵是著名文学家韩愈的弟子，他生活在晚唐宣宗、僖宗（公元847—888年）年间。他在《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写到：

“樵囊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藉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诸藩郡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藉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壁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若石刻，乃射堂旧址，则射礼度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早败苗，百姓人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戎还兵千人，悬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钳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乎？安有廷奏净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败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核根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事，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

孙樵这篇《读开元杂报》既然写于公元九世纪中叶的晚唐时代，那么起码说明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不会晚于公元九世纪中叶。孙樵所称之为“开元杂报”的“数十幅书”就是唐玄宗时的封建官报（玄宗712—756年在位。开元为713—741年），也就是当时的邸报。开元杂报是孙樵自取之名，“开元”为年号；“杂报”是因为它“系日条事、不立首末”记事多，故以“杂”喻之。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这篇文章,详细地写出了唐代官报所载的内容、官报的形式。证明了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不会晚于唐朝。

我国唐代确已有了官报。

目前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还保留着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份报纸,这就是我国唐代的官报——进奏院状。

唐代官报——进奏院状是二十世纪初在我国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发现的。估计在战乱中,当时主持佛事的僧人,为了避免佛经和典籍遭到破坏,就将五万多卷(册)各种各样的史籍、经典都封存在一个石洞里,封闭后可能僧人在战乱中丧生或流离失所,这个藏经洞一直未为人知。因敦煌地区干旱少雨,气候干燥,经历数百年后所藏经籍未受侵蚀。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封闭洞口的泥石倒塌,藏经洞始被住在敦煌的道士王圆篆发现。1907年英国文化特务斯坦因闻讯赶到敦煌,掠走了其中七千件,运至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向达先生三十年代留学时发现,将“进奏院状”复印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断定,此即唐代之封建官报。其正面为六十行“不立首末”的“系日条事”,反面是手抄的曲文。估计进奏院状不是正式官府文告、诏书,恰如现今之报纸。读过以后,可作为废纸在上面任意涂写书画。因而被当时人用作抄写曲文纸了。

自唐以后,尤其是宋代,史书上有关官报的记载已极为常见。《续资治通鉴》卷十七谈到太宗时,“右正言直昭文馆王禹偁言,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团练副使之日……守素与臣同看报状,见李继迁进奏事,因谓臣曰,此贼未是由衷,心恐终怀反侧。”邸报在宋代也称“报状”,上面那段话是说的宋初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王禹偁看报状之事,这是宋史中最早有关邸报的记载。稍晚有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张永镇陈州看邸报时的事。“一日,邸报,同年王文贞公旦等庸,乖崖色不甚悦,奋髯振臂,谓客曰,朝廷安肯用经纶庸济人乎,赖余素以直节自誓,束致仕,无两府之志。”仁宗时(公元1023—1063年)李师中“始事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必斯人也。”(宋史卷232《李师中传》)

除宋代有关史书上记载邸报资料外,宋时的书札中亦常见,如苏东坡与汪道济书中云:

“某见报移汶上,而勅未下。”与千三侄:“近于阳羨买得少田,意欲老焉。寻资后常,见邸报已许。”(均见《东坡续集》卷六)还有欧阳修与梅圣俞书谓:“某顿首,启者。前者见邸报,有襄城之命,乃知当与谢公偕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9)不仅在书札中能见到邸报记载,宋人已将邸报入诗,如苏东坡的“坐观评报谈迁史,闲说滁山忆醉翁”,王安石的《读镇南邸报诗》,杨必大的《读邸报感事诗》,刘垹的《观邸报诗》等等。如果说,唐时有关邸报的记载稀如凤毛麟角的话,那么,到了宋代,涉及邸报的文字可以说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了。

宋以后,邸报流行更广,我们不但能从封建正史上读到有关邸报的文字,从野史中了解邸报的情形,甚至从许多著名的小说中,也能读到“邸报”二字。例如在明朝人所写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中就有以下的描写:“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了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孔目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第17回)在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迟衡山叫将邸抄借出来看。小厮取了出来,两人(迟衡山和杜少卿)同看。上写道:‘礼部侍郎徐,为荐举贤才事:奉圣旨,庄尚志着来京引见。钦此。’两人看了,说道:我们且别,候入都之日,再来奉送”(第34回);“肖云仙看了邸抄,接了上司行来的公文,只得打点收拾行李回成都府。”(第40回)清朝著名小说《红楼梦》中,也有关于阅读邸报的描写:“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提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第99回)

邸报至清代道光年间曾停止发行,直到清末又由封建王朝定名《政府官报》发行。

自唐至清,邸报延续了一千二百年左右,它一直以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的面目行世,成为封建统治者传递消息、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民间报纸

一、宋朝以后的民间小报

小报是相对官报而言的。在封建社会,小报是非法的出版物。小报起源于北宋,它是中国报业史上最早的非官方报纸。至元、明、清各朝,小报都曾大量出现过。

小报虽然产生于北宋,然而这一名称,从史书上看,直到南宋才正式出现。南宋高宗时(公元1127—1162年)担任过中书舍人、交部尚书的周麟之,曾写过一篇《论禁小报》,对小报的产生和影响作过描述:“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行之时,不无小人诤张之说,眩惑众听。如前日所谓召用旧臣,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辈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问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周麟之《海陵集》第4卷第2页)

根据史书有关记载,小报大致情况如下:

小报是一种非官方的报纸,是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刊物。小报被封建王朝严加禁绝,被视为非法的出版物。小报没有固定名称,“小报”是当时读者对它的称呼,以区别于封建官报。北宋期间,尤其是徽宗以后,边患频仍,国家外于衰亡之中,民族矛盾尖锐。对于外来的侵略,存在着战与和的两种立场,朝廷中也存在着主战派和主和派两种力量。主战派与当时各阶层爱国人士,都主张抗战御侮,挽救民族危亡,反对乞和的投降活动。小报反映了两派力量之间的这场斗争,是主战派向主和派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

宋朝以后,小报仍然非常流行,传递朝廷有关情况,以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因而小报在披露朝廷内幕、传播有关消息,尤其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之时,小报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了民众的意愿,比之官办的邸报,它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小报的发行者是进奏官、使臣(地方各军川郡临时派驻首都承受文字的官员)、在省寺监司等政府机关工作中的中下级官员、“书肆之家”和被统治阶级诬称为“不逞之徒”、“无图之辈”和“奸佞小人”之类的人。(见《中国古代的报纸》方汉奇著)

宋代各类矛盾交错,尖锐复杂,斗争激烈。北宋建国不久,就面临着边患的威胁,始而是西夏扰于西北面,辽虎视于东北。继之东北女真族兴起,建立金国。至宋钦宗时,长江以北领土已完全沦陷。南宋在忧患中建国,而封建统治者畏敌如虎,偏安一隅。在152年的时间内,南宋朝廷一直是面临强敌,在苟延残喘中度日。在这漫长的时期中,统治集团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斗争不已。另一方面,自宋朝建国伊始,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四川一地起义则绵延二十余年。方腊起义,梁山泊农民起义,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接之的吉州、信州、建州、虔州、严州、郴州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在这众多矛盾的交错间,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失意者,觊觎权势者都切望了解朝廷动态。而朝廷中最了解

机密者,又是那些进奏官、执掌奏章的通进司官员和受宠于皇帝的人。这些人有的为个人政治利益,有的为经济利益,有的受人之托,有的被人收买,成了非法提供消息的人,也是小报消息的主要来源。

小报的发行,颇受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野的官僚,以及渴求“新闻”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可能从官方邸报中获知重要机密。这种要求,只能从小报中得到满足。小报既有读者,有市场,故得兴旺。为使小报所报道的消息确切、机密,搜集这类消息的“内探”,有的深入皇宫,有的潜入省衙。宋代赵升所著的《朝野类要》中就谈到“……其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

小报并没有固定的规格,有的可以因个人索要,将所探访到的消息或文件录成“单状”,直接寄给本人;有的读者对象广泛,可以广为贩售获利;这种小报也有经雕版印制后“绕街叫卖”的。

小报的内容多限于时事性政治材料。它和官办的邸报一样,也登载皇帝的谕旨诏令,大臣的奏议、台谏之章疏,官吏之升免、迁黜,宫廷之动态等等,但它却不同于邸报所登的这类内容。邸报登载这类消息,是经过严格审核筛选的,即《宋会要辑稿·刑法》所说的:“朝报逐日自有门下后省定本,经由宰执终可执行”。然而小报所登载的谕旨诏令、奏议章疏多为朝廷所不允许公之于众的“内部材料”,是属于保密而不能外传的情况。这是小报所不同于邸报内容的第一点。第二点不同是小报所登载的消息快。邸报所登载的消息,由于层层上报、审核,或有意滞留,因而多为“明日黄花”。而小报为“非法出版物”,不经检审,“有闻必录”,因而快。这两点,一是新,二是快,适应了当时读者获得新闻的需要。宋代及宋以后,小报所载内容,与封建统治者的意愿,多有违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意愿,尤其是北宋末年以至南宋,属小报最为兴旺之时期。这一时期的小报多登载边防消息和抗金活动,突破了封建政府对这类消息的封锁,激励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反映了主战派和群众的呼声。小报至宋以后,仍然非常流行。元朝曾发现民间有将朝廷的“诏旨条画”刻成小本“卖于市者”。明朝也有人将大臣的奏疏“刻印遍售”。到清朝,小报亦称小钞或报条,所刊内容多以朝廷没有公布的“大小事件”为主。

小报问世后即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骇惑听闻”、“为害非细”的非法出版物。自北宋起,封建政府曾多次禁令小报的发行。但家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即命开封府对小报发行者要“密切根除,许人陈告,勘鞠闻奏”。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令开封府立赏一百贯,许人告捕”,时隔两年(大观三年),小报仍然风行。臣僚在向皇上上书谈到小报时说:“喧播中外,动摇上下……浸淫成风,为患不细,伏望特降睿旨,令开封府出榜禁绝施行”。在朝廷三令五申情况下,小报并没有被禁绝,而流传更盛,翌年(大观四年)不得不将捉拿小报创办人的赏额提高为五百贯。南宋建国后,小报更为发达,统治者对其查禁尤为严厉,孝宗(淳熙年即1188年)明令发卖小报者要“编管五百里”。在这之前,对检举者的赏钱也提高到一千贯。可见统治者对小报的流行,如沙在眼,必欲除之而后快。至明、清两代,史籍上多有查禁小报的记载。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左都御史揆叙疏言:“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探听写录,名曰小报,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严行禁止。”(蒋良骥《东华录》卷23)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因“报房捏造小钞,刊刻散播,以无为有……着兵刑二部详悉审讯”(《东华录》卷8),牵涉此案的何遇恩与邵南山,因此被斩。

自小报产生后,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它始终被认为是非法出版物而遭到查禁。

二、明清两代的京报

明朝中叶(约公元十六世纪前后),为了昭示皇恩,广播“圣德”,扩大诏书政令的影响,封建王朝允许民间创办报纸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取得合法地位的非官方报纸——京报。

京报名称的由来,主要是这种民间经营的报纸多创始和兴盛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北京和南京在明代被称为两京,作为京城同等看待。所以在北京与南京出版的报纸统称京报。京报有时也被

称为邸钞、邸报、除目和条报,因为它所载内容与邸报相近,名称易于混淆。

京报既经朝廷允许发行,在封建专制皇权至上的制度下,京报是不敢刊登有违于统治者的内容的。

京报主要登载的内容,几乎与官办邸报如出一辙。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说:“‘京报’所载,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摺,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且这些诏令奏摺,还不及官方邸报所载齐全。许多能登载于邸报的诏令奏摺等,因保密起见,有许多不允许京报刊登。

京报消息的主要来源是内阁的发钞机关和各省设在首都的塘务办事处。报房的“钞报人役”经常从内阁和各省塘务办事处那里抄录出封建政府允许发布的奏疏、谕旨等文件和消息,然后登之于京报上。因而京报内容绝大多数都是皇帝的起居言行、官吏的升迁免黜,以及歌功颂德的奏疏条陈等。

京报内容虽然近同于邸报,但其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在统治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况下,从它的版面中,也透露出了丝丝不同于邸报的新鲜气息。

第一个不同是京报已有探报人自己采写的一些新闻。第二个不同是京报已偶而刊登社会新闻。京报对于社会上所发生之奇闻异事,已乐于刊登,借此以吸引读者。

清代,朝廷已不允许京报刊登社会新闻了。京报内容与官报已别无二致。

京报被允许公开发行后,随之兴办起了专门以刊印、编撰和发送京报的行业。这样,明代的报房就出现了。第一家报房约产生于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始见之于北京,随后南京、苏州、杭州、江陵也相继有了报房。报房以出版京报为主要业务,亦兼营邮政、印刷和报录等业务。

明亡以后,报房继续存在,京报仍然出版。报房业务在清代有了发展,清末仅北京就有十多家,著名的报房有聚兴、聚升、聚恒、合成、社记等。明、清以来,京报的编报、抄报、印报、送报已成为职业。有记载可考的,最早职业报人,是明思宗(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时北京有个叫何光烨的,就是以“送邸报为业”。(《祁敏公日记》祁佳彪著,崇祯五年二月初一目目录)至清末,仅北京报房的职工即达三百人。这些报房多集中在前门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

清朝时京报已多为日刊,每次出一小册。戈公振先生曾述及京报形状是“以竹纸或毛太纸印之,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以黄色纸为面;长约6寸,宽约3寸”,(《中国报学史》第33页)封面上印有红色“京报”两字为报头,下面附有报房的字号图记。也有的京报以白纸作面,加印红色的人物图案作封面。“京报以活体本字排印,常湮漫不可读,各报房所出,其内容亦不尽同”。京报每册售十文。有零售,亦有固定订户,每月收费二百文。

京报的读者以官僚、缙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为多。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即常阅读报房所出之京报,以探测明廷虚实。明末学者顾炎武之父,年七十还阅读京报不辍,并抄录京报重要内容;黄宗羲也大量收藏京报,“蓄之以以为史料”。许多豪门以及新贵,都以订阅和日看京报为高雅的表现。订购阅读京报曾风行于市。有人作竹枝词:“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请亲朋念我听。”以讥讽附庸风雅者。

京报自明代中叶起,历时约四百年。京报在封建统治者允许下公开发行,所载内容多为歌功颂德的奏疏和宣扬皇恩圣德的诏谕。所起作用,基本与官报一样,是维护统治秩序,欺骗和愚弄人民的宣传工具,京报至辛亥革命后才陆续停办。京报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京报亦是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宣传机关。

第二章 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的传入

第一节 近代报刊在华南沿海的出现

一、近代报刊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近代报刊是内容与形式都比中国古代报纸先进的新型报刊,是在鸦片战争前西方列强图谋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是一个在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大国,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政治上是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条件下,不仅官办的邸报,就是民间报房的《京报》,也没有什么新发展,而是流于程式化,长期处于主要抄传谕旨、奏折等官文书的状况。

就在中国因循守旧,且因腐败从18世纪中叶走上国势日衰的下坡路时,资本主义在欧美迅猛发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自18世纪60年代起,又开始了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工业革命,生产力大为提高,科学文化日益发达。诞生于16世纪的近代报刊,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功用日显,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传媒和舆论工具。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早在16世纪,葡萄牙等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殖民骚扰。工业革命开始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掀起了殖民扩张的新热潮。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在统治了印度,侵入缅甸、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地区后,加紧了对中国的扩张。商船和兵舰,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接踵而来,带来了商品、鸦片和圣经,也带来了近代报刊。

二、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的出现

世界上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最先出现于东南亚一些华人聚居地区。

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世界的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改变人们的思想信仰为业,起着政治讹诈和武力威胁起不到的特殊作用。由于西方科学文化事业的发达,18、19世纪英美等国传教士的海外传教活动,不再仅靠口头布道,而往往借助西方某些科学文化成果,通过开医院、建学校、出书籍、办报刊等来笼络人心,扩大影响。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严禁传教。英国传教士因无法在中国公开活动,不得已转往东南亚一些华人聚居地区开展工作,以期起到渗透和过渡作用。

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是英国基督教向海外传教的一个机构。1807年9月,马礼逊到达广州,潜居在商馆里,学中文,编英华字典,翻译《圣经》。1813年伦敦会增派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工作。为摆脱困境,米怜根据赴东南亚一带考察了解到的情况,与马礼逊商定在华人聚居的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建立能放手活动的传教基地。1815年米怜带领中国刻字工人梁发等到达英国殖民地马六甲,按商定的计划,建礼拜堂,办学校,设立印刷所,出版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一些宗教书籍及英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1815年8月5日,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刊物。该刊以传教为宗旨,绝大部分内容是阐释基督教教义、介绍《圣经》的文章,如《神理》、《圣经之大意》等。其次是宣讲伦理道德,如《论仁》、《忠人难得》等。两次是介绍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如《论行星》、《论日食》等。后期增辟专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开始涉及时政。体裁上既有论说、短论、杂句、书信、编者按、插图,也有故事、寓言和七言诗。没有新闻专栏,只在第2期登载过一篇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新闻,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

该刊雕版印刷,中国书式,每月初印500册后,增至2000册。免费赠阅,传布于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米怜回忆提及:“中国境内亦时有输入。”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是米怜,其他撰稿者有麦都思、马礼逊、梁发等。

米怜很注意研究和迎合读者。考虑到东南亚华人多属下层劳动者,热爱祖国,文化程度不高,米怜主张刊物内容要简短、通俗、生动。所以,该刊的传教文章大量引用中国儒家语录,以增加亲近感和说服力;并常用对话、讲故事等方式,以求生动易懂;长篇文章则往往采用章回体的形式连载,以求短小。1821年,该刊因米怜病重停刊。

为继承米怜的事业,曾协助米怜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1823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办了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该刊从内容到形式均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只稍增加了些地理、历史知识,出至1826年停刊。

1827年,伦敦会另一传教士纪德于马六甲又办了中文月刊《天下新闻》。仍是继承前两刊的事业,但内容侧重时事政治,载有较多的欧洲新闻及少许中国新闻。样式上也改为散张白报纸铅活字印刷。比前两刊更近代化。出版一年左右停刊。

三、近代报刊在澳门的出版

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报刊,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创办的。

早在16世纪,葡人就开始窃居澳门。自18世纪末起,随着英、美等国殖民主义者的东来,澳门人口渐增。1822年8月,受葡萄牙本国民主革命的影响,以土生葡萄牙人为主的澳门立宪派发动了“民主运动”。出于政治需要,运动领导人巴波沙少校创办了葡文周报《蜜蜂华报》,由一些天主教教士编辑。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该报是澳门葡人社会新当权者的喉舌,以鼓吹立宪派主张为宗旨,猛烈抨击贵族保守派。1823年9月下旬,以澳门天主教主教为首的保守派,联合葡印总督派来的军队,发动政变,巴波沙等被捕。《蜜蜂华报》先是被一些报纸宣判为内容恶毒,当众烧毁,不久报馆被查封。保守派利用原设备,出版了葡文《澳门报》,出版两年,因保守派权力机构被新总督解散而停刊。1833年,葡萄牙本国的立宪派最终战胜了保守派,澳门葡人社会再趋活跃,又陆续出版了6种葡文报刊。主要有《澳门钞报》(1834年)、《帝国澳门人》(1836年)、《澳门政府公报》(1838年)等。

澳门的葡文报刊,主要服务于葡人内部的政治、经济活动,不大关心中国事务,对外界影响不大。但在近代报刊出版方面,仍具有带动效应,是近代报刊传入中国的一环。

另外,鸦片战争前,澳门是欧洲来华人员的主要居留地,特别是1831年葡人正式宣布不禁止外国人人澳居住后,在澳英美人士也活跃起来。马礼逊之子马儒翰1833年在澳出版了英文周报《杂文编》,内容包括基督教、政治和商业材料,每期还有一篇中文稿,只出了4期,即因遭到澳门天主教会势力反对,被迫停刊。

约在1837年或次年,欧洲人罗在澳门创办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刊物《依泾杂说》,英文用铅字、中文用雕版印刷,因便于学习中、英文,受到部分人欢迎,出版未久,即因讥刺官府陋规而被查禁,是被中国官府查禁的第一个近代报刊和外人报刊。

四、近代报刊在广州的出版

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起,外人开始在广州出版报刊。这是外人在华办报的一个重要进展。

19世纪20年代,英国生产大幅度增长,并于1825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对华贸易更加活跃,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日益热烈。而同时,中国道光皇帝登基后,一再谕令禁烟。在这种形势下,对打开中国市场最急迫的在华英美商人急需沟通信息、传递情报,急需就西方的对华政策发表意见。于是,开始出版报刊。

广州第一家近代报纸《广州纪录报》出版于1827年,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英文报纸。美商伍德创办,不久转归英国鸦片商马地臣,初为双周刊,后改周刊。之后,广州又出现过6种英文报刊,主要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1831年创刊,周报,伍德创办,维护美商利益,1833年停刊。《中国丛报》1833年创刊,月刊,由马礼逊倡议,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并主编,美商奥立芬提供开办费及房舍,并负责补贴亏损。《广州周报》1835年创刊,周刊,由英国鸦片商颠地支持创办,代表英商自由贸易派利益。

上述英文报刊中的3家周报,是商业报纸,都以很大篇幅刊载商情信息,其中《广州纪录报》和《广州周报》还附出了单独发行的商业行情报。这几家商业报纸为了所代表的商业团体的利益,围绕自由贸易等问题,经常发生激烈争吵。

上述各家报刊都很注意刊载中国新闻与材料,尤以《中国丛报》最为突出。该报虽为传教士主编,但所载宗教文章甚少,反而不惜篇幅地大量刊载有关中国的各种资料,从历史、地理、物产、贸易、政治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直至军事实力、海防现状,极为详细广泛,并大量译载中国官方有关禁烟的函牍文电。

在对中国人的态度上。它们相当一致,都大肆嘲笑中国的落后、国防的薄弱、官吏的昏庸、侮骂中国人愚昧野蛮,攻击中国的禁烟政策,批评西方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政策,甚至公开鼓吹武力侵华。

这些英文报刊,除在广州、澳门发行,还发往东南亚、印度和欧美,每期发行数百份。在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起到了提供情报、出谋划策、鼓噪煽动的作用。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它们中仍在出版的3家均迁至澳门。

在新闻业务方面,这些英文报刊都很重视新闻和言论,编排和印刷亦和欧美本土报刊相仿,比同期的中文刊物先进得多。其中,有的曾刊文介绍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观点,有的还刊印过号外。

1833年8月,外人在广州的办报活动有了新进展,伦敦会传教士郭士立创办了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

郭士立原籍普鲁士,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到东南亚传教,不久,脱离该会,转为伦敦会工作。从1831年起,他曾以扮成中国人等方式,多次到福建、浙江、上海、山东、天津乃至中国东北沿海地区,侦察、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鸦片商带路走私鸦片。随着对中国的熟悉,他对中国视西方人为“蛮夷”的观念极为反感,于是,为“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的观念”,而创办了《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是外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雕版印刷,中国书式,内容结构像《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一样,也由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三部分组成,文章中也常引用中国儒家语录,明显表明了与《察世俗》的承继关系。但由于办报地点、读者对象和直接动机不同,《东西洋考》的宗教内容大为减少,科技文化知识增加了许多,并且,科技知识所着重介绍的,不再是天文学,而是火车、沉箱等西方的“奇技”等实用科学技术以及欧美等国的人文史地。伦理道德部分也转为大谈友好、和睦、买卖公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该刊业务上比《察世俗》有

改进,增设了新闻和言论专栏,每期均刊载中外新闻,言论的现实针对性较强,如鼓吹中国应学习他国所长等,并极力粉饰西方人来华的意图。该刊第5期曾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近代报纸的产生、现状及出版自由观念,是中文报刊中第一篇新闻学专文。该刊得到了广州各国鸦片商、外交官、传教士的普遍支持。因郭士立忙于当翻译、向导,难以保证刊物出版,1835年2月,由广州外国人联合组织的“对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出至同年7月,随该会的出版机构迁往新加坡。

1838年10月,伦敦会的麦都思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月刊《各国消息》,完全取消了传教内容,主要登载以亚洲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的人文、史地、时事,也刊载少量中国消息。中国书式,石印,是第一份石印的中文刊物。附有货价行情表,亦为国内中文报刊之首创。出8期左右,因局势紧张停刊。

五、鸦片战争前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特点

这个时期外人在华办报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鸦片战争前,外人先是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出版了3种中文刊物,之后,在澳门外人居留地和广州商馆区又出版了19种中外文报刊,这是近代报刊冲击中国大门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中英文报刊,中文刊物大都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创办的。这些刊物旨在宣传显示西方的文明。消除中国人的戒心。言论谨慎,极力鼓吹中外友好。而以西方人为读者的英文报刊,则重在传递情报与信息,讨论对华政策,毫无顾忌地嘲笑、攻击中国,侮辱中国人,公开煽动对中国武装入侵。

第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多由传教士主办,得到了商人、外交官的支持。英文报刊多为商人出资创办,其主要编撰者不少是传教士。出于打开中国大门的共同目的,在华外人通力合作办报。

第三,在这些中英文报刊的编撰工作中,担当主力的是传教士。主要有马扎逊、米怜、麦都思、裨治文、郭士立等。他们都懂一点中国语文,比较熟悉中国情况,是当时西方甚为稀少的“中国通”。因此,除了传教、办报,他们都还以翻译、秘书、向导等身份,积极参与了鸦片走私、刺探情报、军事行动等直接的侵华活动。

第四,这时期外人在华的办报活动,主旨不在报业经营,而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宣传和情报活动。免费赠阅的中文刊物,明显出于宣传。就英文报刊来看,到30年代初,留居广州的外人不过300人左右,但却同时出有两三种报刊。继《广州纪录报》问世的《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创刊号上直言:“在像广州这么小的社会再办一种报纸可能是多余的”,但“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这道出了为占一席言论阵地而办报的目的。英国鸦片商马地臣、颠地、美国商人奥立芬出资办报,其目的主要在于沟通信息,刺探情报,便利包括鸦片走私在内的对华侵略,和作为他们的喉舌,影响舆论与西方国家的侵华政策。鸦片战争前的外人报刊,是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的宣传舆论工具。

外人近代报刊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

一、殖民主义者在华所办的中文报纸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急剧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西方殖民主义者以战舰火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个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传教士们在硝烟中,装扮成上帝的使者涌进了中国,配合着武力侵略,开展了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愚弄的宗教渗透。

自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起,每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殖民主义都忘不了加进“自由到中国传

教”这一条款。《南京条约》中规定了“耶稣圣教及天主教”的自由“传教活动”；1844年的《黄埔条约》明确将“传教权”写进条款；1858年的《天津条约》更进了一步，规定“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的足迹迅速向我国内地蔓延。传教士们的办报活动，比之鸦片战争前，得到较快的发展。1860年，外国商人及传教士办的报刊达到32家，1890年即为76家，占中国所有报刊的90%以上。外人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

《遐迩贯珍》1853年创刊于香港，每册12至24页，初由麦都思主笔，后由奚礼尔、理雅各主笔，1856年停刊。

《六合丛谈》1857年创刊于上海，每月一册，所载为宗教、科学、文学、新闻等，由伟列亚力主编。翌年迁日本。

《中外新报》1858年发刊于宁波，每期四页，为半月刊。内容为宗教、新闻、文学、科学。后改为月刊，由玛高温主持。至1860年停刊。

《香港新闻》为《孖刺报》之副刊。始于1861年，共出8卷，专记船期、货价，系纯粹商业性质之杂志。

《中外杂志》1862年发刊于上海，每月一册，约12页至15页，至1868年停刊。

《中外新闻七日报》1865年发刊于广州，共出刊152期，内容以新闻、科技、宗教为主。

《教会新闻》1868年发行于上海，为周刊，林乐知为主笔。内容始而专言宗教，至第三百期后兼言政治。至1904年停刊。

《中西见闻录》1872年7月发刊于北京。刊录各国近事及天文、地理之学。1876年易名《格致汇编》，改在上海出版。始为月刊，后改为季刊。至1890年停刊。

《小孩月报》1875年出版于上海，由范约翰所编辑。文字浅显易读，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值得称道的是开始刊登插画，为铜版雕刻，很精美。至1915年改名为《开风报》，出五期后停刊。

《画图新报》1880年起刊行，1913年终刊。为上海圣教书会出版，每月发行，雕刻铜版精印，内容有地图、风景、天文、地理、科学、风俗、时事、名人像等。

《申报》1872年由英人美查等合股开设于上海。聘请华人何桂笙主笔政。美查为英国来中国的淘金者，在经办《申报》之前，经营过茶叶出口贸易及缫丝工业。他创办《申报》的目的，为的是经济上的收益。为此，他将办报编辑稿交给了中国主编，以中国人的文笔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而自己专管经营。《申报》的兴旺，使美查逐步致富，陆续开设了江苏药水厂、燧昌自来火局、昌申书店、点石斋石印局和肥皂厂等企业，并在新加坡拥有四万亩的农场，从而成为一个靠剥削中国人民起家的百万富翁。

《申报》刚创刊时只销售六百份，至1919年已成为销售三万份的大报，资产由初办时的1600两，猛增到1912年的十二万元。

《申报》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曾经于1876年3月30日附出过一份浅显易读的白话报——《民报》，这是我国新闻史上最早的白话报。每星期二、四、六各发行一张。其发刊告白说：“此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每句及人名地名尽行标明，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申报》1877年9月还创刊《瀛寰画报》，载世界时事风俗山川图说，为不定期刊，每本十余页，图画为英国画师所画，说明由察尔康所写。共出五卷而止。但是《瀛寰画报》与《小孩月报》一样，所载之雕刻铜版，为英国报刊用过之废品，捎来中国再翻印出刊以欺哄中国人民。故而《小孩月报》与《瀛寰画报》均不能称之为近代新闻史上最早的画报。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早的画报，还是由《申报》馆所创。1884年5月8日所创刊的一种新画报，为旬刊，售价5分，每本共8幅图画，所画

内容为“新闻中可喜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这一画报因由《申报》馆出刊,由点石斋石印局印制,故名《点石斋画报》,这是我国第一份画报。

《申报》自1872年创刊后,全1906年美查将《申报》出售给中国报人席子佩,1912年又转售给史量才,自此《申报》才成为中国人经营的报纸。1949年上海解放后,《申报》才停刊,前后历时78个年头。

《新闻报》也是一张在上海由外人创办,后转售中国人的一张著名的报纸。《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由英国商人丹福士创办,1899年转售给美国人福开森。始而销售三百份,至1919年达45782份。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号称发行十万份,为当时中国民办第一大报。1929年由福开森经手出让给中国人史量才等。

最后要介绍的是帝国主义所办的《万国公报》。该报是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该刊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原名《教会新报》,始为周刊。1874年9月5日改名《万国公报》。其间曾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883年—1888年)。1887年“广学会”成立后,将其复刊,当作“广学会”机关报。至1907年停刊。前后出刊近40年,达一千期。虽然名为教会组织报纸,实际多刊登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文章。主要编辑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知居住中国达46年之久,李提摩太在中国呆了45年,都是中国通。他们所办《万国公报》是专门办给中国的统治阶级收看的,其目的是为了将清廷上层的各方面人物作为自己的宣传对象。

二、殖民主义者在华所办的外文报纸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流氓、恶棍纷纷来华。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数量逐年上升。以上海为例,1849年仅有外国人175人,1870年为1666人,1880年为2197人,1895年为4684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增加了二十多倍。这些外国人多数居留香港、广州、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和北京。为适应他们吞噬中国这块肥肉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在以上那些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他们自己主办的、以他们这伙“冒险家”和本国的财阀及殖民主义者为主要对象的外文报纸。这些报纸分属于英、美、德、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文种计,有英文、日文、葡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大部分是英文;以刊期计,有月刊、周刊、三日刊、日刊、大部分是日刊;总数在一百二十种以上。主要的有1845年在香港出版的《孖刺报》、1857年出版的《德臣报》、1881年出版的《南华早报》,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上海航运日报》、《大美晚报》(1867—1949)和1894年在天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等。

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创办的外文报刊中,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占有特殊的地位。《字林西报》原名《北华捷报》,周刊。创办于1850年8月3日,1864年7月1日才改用前一名称,每天出版,《北华捷报》则转为它的每周增刊。这个报刊从创刊起,就和英国派驻上海的外事机关和上海的租界当局保持密切联系。1859年,上海英国领事馆特别指定该报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告、新闻公报及付费广告,也都优先在该报刊载,经费上也得到它们的资助。因此,在上海的外国人称它为“英国官报”。

《字林西报》经常反映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在中国有特殊“商务”利益的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家的思想观点。它有一个口号,印在言论版的上端,叫做“公正而不中立”。“公正”只是一个幌子,“不中立”倒有点符合事实。它在为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作鼓吹的时候,是从来不含糊、不模棱、不“中立”的。早在创办人奚安门所写的发刊辞中,这个报纸就公开表示:

“我们别为自己假扮,……我们的热情的努力,将唤起一种对于广大的商业,和亲切的国际关系之安适。我们现在是置在起点上,如果可能的话,它的结果不是短促的,消灭的,或旋作旋辍的,而